

祖徕石先生文集



中華書局
(宋)石介著

徂徠石先生文集

Culai Shixiansheng Wenji

〔宋〕石 介著

陳植鵠點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1³/₄ 印張·1 插頁·232 千字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6,500 冊

統一書號：2013·224 定價：1.35 元

前言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人，嘗講學家鄉徠徠山下，學者稱徠徠先生。介出身農家，高、曾以來，耕田爲業，豪於鄉里。其父石丙（公元九六九——一〇四〇年）開始做官，但到六十多歲才當上縣令。介有一兄（亡其名），三弟企、會、合，三子彭哥、川哥、徠哥，其一學名爲師訥，俱不顯。

真宗景德二年（公元一〇〇五年），石介出生於本鄉。仁宗天聖八年（公元一〇三〇年），二十六歲進士及第，登上仕途。慶曆五年（公元一〇四五年）七月以疾卒於家，終年四十一。有徠徠集二十卷傳世。

（一）

石介的一生事迹大致可分爲四個時期。

一、中進士（公元一〇三〇年）以前

在今天所能見到的石介著述中，作於二十六歲中進士以前的大概只有過魏東郊詩一篇。古魏地，北宋隸河北大名府，宋初古文家柳開卽出生於此，石介過魏東郊詩正爲緬懷柳氏而作。詩歌對其備極

推崇，至譽爲「事業過皋夔，才能堪相輔」。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石介對柳開的贊美，不僅限於古文的道統方面，推戴他「述作慕仲淹（王通），文章肩韓愈」，而且極力頌揚其武略：「帳下立孫吳，罇前坐伊呂。笑談輻鈐間，出入經綸務。」這反映了早期的石介，不惟具有齊魯之鄉的古文傳統，而且不乏北國少年的尚武精神。

大約與游歷河朔同時，石介來到當時教育事業比較發達的宋城（即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進南都學舍誦讀詩書。那時，北宋前期的政治改革家和學者范仲淹方居母喪，因知府晏殊之請，主持應天府學，四方青年紛紛慕名而來，一時出了許多人才。其尤著者除石介外，還有後來因范仲淹之薦入府學執教職的孫復（公元九九二——一〇五七年），慶曆新政時，他們都成了范仲淹的積極支持者。

二、鄆州、南京任幕職官時期（公元一〇三一——一〇三八年）

天聖八年（公元一〇三〇年），石介登第，授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鄆州觀察推官，次年到任。其年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以年老知兗州，旋以太子少傅致仕歸鄆城。石介因職務的關係，得與交接，當面求教，頗獲這位三朝宿儒的青睞。

明道二年（公元一〇三三年），石介仍在鄆州任內，碰到了一起自仁宗即位以來最大的政治變動。是年四月，太后劉氏去世，仁宗親政，大斥后黨，呂夷簡、夏竦、晏殊等皆坐罷。不久，重新起用真宗朝曾經反對立劉氏爲后的李迪爲相，以范仲淹、范諷、孔道輔、李紘、郭勸等爲諫官。這些人大多與石介有過交情。其時恰值黃河流域大旱二年後始逢霖雨，石介精神振作，對仕途充滿了信心，表現得異樣

活躍。收入徂徠集的一些政論文章，如上范中丞書、上郭殿院書、上孔中丞書、上李雜端書、原亂及專著唐鑑等，均作於這段時間。唐鑑一書凡五卷，已久佚，據唐鑑序的說法，初意在通過唐史的摘編，使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轍，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宮，勿委任於姦臣。（徂徠集卷十八）其鍼對當時政治形勢而發的意圖，昭然若揭。

石介與鄆州舉子土建中（公元九九八——？年）的友誼，也在這段時間開始。明道二年（公元一〇三三年）秋，建中得解，石介代通判李若蒙草薦表，並爲他致書御史中丞范諷、樞密副使蔡齊（公元九八八——一〇三九年）等，多方延譽，引爲同道。

景祐元年（公元一〇三四年），建中登進士第，解褐知大名府魏縣，石介也調任南京爲幕職官。通過土建中的關係，石介又同孫復結識。兩人一見如故，直以韓孟再世相許。孫復本晉州平陽人，屢舉進士不中，時方流落京畿。景祐二年（公元一〇三五年）冬，石介爲其築室泰山之麓，幫助他定居山東，講學授徒，並以身下之，率任城張洄、鄉人李蘊等同拜孫復爲師。此後，兩人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這幾年裏，另一位同石介過往親密的朋友是歐陽修。歐陽修與石介爲同年進士，介爲鄆州推官時，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公元一〇三四年），二人同時秩滿，介徙南京，修因樞密使王曙之薦歸闕授館閣校勘。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六有與石介推官書兩首，即作於景祐二年秋間。書中曰：「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爲文。」文即石介反楊億，斥佛、老的代表作怪說三篇及中國論等。歐陽修在信中坦率地

指出石介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的缺點，但石介未能接受。（見徂徠集卷十五答歐陽永叔書）不久，石介受到了自己缺點的懲罰，才有所悔悟。這一年冬天，因御史中丞杜衍推薦，御史臺辟石介爲主簿，旋以介上書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的借口，罷而不召。這是石介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挫折。當時，歐陽修曾撰上杜中丞論舉官書，爲石介鳴不平。其文略云：「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七）歐陽修的這一懷疑是有道理的。北宋朝廷一再降詔錄用唐、五代諸國之後裔，其實無非是做樣子，臣下反對，不但以爲過，有時反而欣賞他們對本朝的忠心。即在石介被罷的同一時間，梁顥之子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乃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仁宗即表示贊賞，提拔他擔任審刑院詳議官。（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可見石介被罷，當另有原因。

今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五，載有石介上樞密使王曾書一首，其略云：

正月以來，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宮廷傳言，道路流布。或說聖人好近女色，漸有失德。自七月、八月來，所聞又甚，或言倡優日戲上前，婦人朋淫宮內，飲酒無時節，鐘鼓連晝夜。

宋仁宗趙禎（一〇一〇——一〇六三）少年登基，其時方二十五歲，是個好色的君主，自尊心又極強。當時爲宮禁事上諫的還有滕宗諒（子京）等，終以「語太切直」遭貶。（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五）石介之語，猶甚於滕疏，仁宗自然更高興。據石介兩年後寫的上王沂公書回憶此事：「介又嘗上疏天子，妄議赦書，帝赫斯怒，禍在不測，相公從容救解，不置於法。」（徂徠集卷十四）如果僅僅爲

了赦書之論，如前所述，必不致於引起仁宗「禍在不測」之赫怒。王曾救解一節，正好透露了其中舊債新賬一起算的消息。此在局外人看來，自然是石介「詆時太過」而召禍，然對石介來說，他倒以為自己是個忠言直諫的好官。事後不久，他在閑興一詩（徂徠集卷三）中發抒了心中的不平：

大匠構厦屋，取直棄曲木。

如何官擇人，棄直獨取曲。

但石介生前自編徂徠集時，上王樞密書畢竟舍去不載；歐陽修墓誌銘、宋史本傳亦語焉不詳。今特爲表出，以補誌、傳之缺。

石介初至南京，曾擔任過一年左右的學官，當時的知府是劉隨。劉隨既崇儒又禮佛，故府學東書庫有儒、道、釋三教畫像。石介利用學官的職權，令去道、釋畫像，獨尊儒學，實行他在怪說等文章裏提出的攘斥佛、老的主張。劉隨沒有責怪他，只是勸他鋒芒不要太露而已。景祐二年（公元一〇三五年）秋，劉隨歸闕，夏竦知南京應天府，時介已改任留守推官，徂徠集卷二十有上南京夏尚書啟等文字四篇，即爲夏竦而作。雖夏竦後來因反對慶曆新政，與石介等成爲死敵，但此時兩人作爲上下級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

三、遠官嘉州、居喪徂徠時期（公元一〇三八——一〇四二年）

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介父石丙得官單州碭山縣令。三年後將移任邊遠地區。寶元元年（公元一〇三八年），石介南京秩滿，以父年老（時丙已七十歲），請於吏部，代父遠官，遂任嘉州軍事判

官。是夏入蜀，一路上寫了大量卽景咏懷及應酬贈答的詩歌。這幾個月，是石介一生中詩歌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九月，石介抵達嘉州，蒞任才一月，因母亡，卽歸家奔喪。

寶元二年（公元一〇三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元昊入寇，西北邊釁肇端。自景德元年（公元一〇〇四年）澶淵之盟以來，近四十年沒有大的戰事，北宋朝廷遂滋長了太平麻痹思想，此時邊釁驟啟，倉皇應付，十分狼狽。石介身在徂徠，心憂天下，常以邊事爲念，偶作一詩集中反映了他這一方面的思想狀況。其詩末云：

平生讀詩書，胸中貯經綸。

薄田四五畝，甘心耕耨勤。

倚鉏西北望，涕淚空沾襟。

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自己却賦閑在家，滿腹經綸無處施展，石介的心情是多麼地焦急啊！但不久他的家庭又遭變故，使他無法實現盡快返回政界的願望。康定元年（公元一〇四〇年）三月，石丙亡故了。石介母服未滿，又守父喪。居喪期間，石介開館聚徒，以易傳授諸生。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石介及孫復、胡瑗三人。（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二五胡先生墓表）

四、國子監學官時期（公元一〇四二——一〇四五年）

慶曆二年（公元一〇四二年）夏，石介服除，因杜衍之薦，召入爲國子監直講。同年十一月，孫復亦因范仲淹、富弼之薦，由布衣超拜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當時，正處於慶曆新政前夕，范仲淹、歐陽修

等亟思振興教育，爲政治改革培養人材。於是太學大興，生徒由原來二、三十人光景驟增至數千名。石介如魚得水，神采飛揚，利用他所據有的當時國家最高學府的講席，力圖左右文壇的風氣。北宋古文運動，自天聖以來，由於歐陽修、尹洙、蘇舜欽等人的共同努力，已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到此遂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作爲勝利的標志，一是貢舉制度的改革（這一點至慶曆四年乙亥詔，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來），一是太學教育復古之風的形成（這一點雖然導致了後來以怪僻爲宗的「太學體」的滋生，深罹矯枉過正之弊，但此時則是古文運動得力的同盟軍）。這兩者因與知識分子的仕途得失息息相關，所以無形中成了兩根左右文壇風氣的指揮棒。據北宋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中載：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道。時庠序號爲全盛之際，仁宗孟夏變輿有玉津墦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善首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爲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於堂，集諸生，誚之曰：「此輩鼓篋游上庠，提筆場屋，稍或黜落，尚騰謗有司者，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是，此物宜遽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

如此旗幟鮮明地升降諸生、掃蕩時文，實有摧枯拉朽之勢。然石介之用心，却非拳拳於文章經義之間，而別有更重要者在。據當時主持太學的北宋官僚田況回憶說，石介任國子監直講期間，「好議論都省時事，雖朝之權貴，皆譽警之」。（儒林公議卷上）可見他的抱負是在政治方面。慶曆三年（公元一〇四

三年），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着手實行一系列政治革新的措施。石介喜形於色，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效韓愈元和聖德頌，賦慶曆聖德頌一首，其譽范仲淹、富弼等，至擬之「一變一契」。並以「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直斥夏竦，措辭十分激烈。據蘇軾回憶，他在慶曆三年「總角入鄉校」，即嘗誦習其辭。在四川眉山這麼僻遠的地方，連七歲的小孩都知道此作，可見此頌在當時影響之大。

慶曆聖德頌的創作，是石介生平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後世評論甚多，毀譽不一。頌剛脫稿，孫復就對石介說：「子禍始於此矣！」（祖徠石先生墓誌銘）孫復此語，還僅僅就石介個人而言。實際上，後來朝中反對派羣起而攻，導致慶曆新政的迅速失敗，慶曆聖德頌不能不說是起了導火線的作用。南宋葉適曾在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九皇朝文鑑三指出：

「慶曆聖德頌，後世莫能定其是非，按……仲淹方有盛名，舉世和附，一旦驟用，出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無愧，頌之可也。而介所講未詳，乃以二十年間否泰消長之形，與當時用舍進退之迹，盡於一頌，明發機鍵以示小人，而導之報復，易所謂「翩翩不富」，「城復於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徒以自禍也。」

要之，石介寫作此詩，主觀意圖自然不錯，在為改革造輿論方面也一度曾起了不小的積極作用，但方法不對頭，有點操之過急和授人以柄。據傳范仲淹當時曾向韓琦表示過對石介的不滿：「為此怪鬼輩壞事也。」（宋袁袞《楓窗小牘》卷上）但這種過猶不及的缺陷，范仲淹自己也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故執政未及

一年，變法便宣告失敗了。

慶曆四年（公元一〇四四年）三月二十日，石介因韓琦之薦，曾擢直集賢院，仍兼國子監直講。同年十月，即成衆矢之的，不自安於朝，主動要求外放，得通判濮州。未及赴任，即於次年七月病卒於家。這是石介政治生涯中碰到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大挫折，它一直影響到石介的身後。石介既歿，夏竦等猶銜恨不已，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石介書信，竦因而散布介實不死，弼陰使人契丹謀起兵的謠言，致使朝廷半信半疑，於當年十一月和慶曆七年（公元一〇四七年）六月兩次下令查核石介存亡實況，只因知兗州杜衍、提點京東刑獄呂夷簡的保全，方免發棺之酷。而其妻子、兒女受牽連，則被羈管他州，流亡了好幾年。歐陽修重讀徂徠集：「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皆欲殺，聖言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斷其棺。」（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三）即此事之紀實。

（一）

上面分四個時期簡單地介紹了石介的生平，現在再就他的文學創作談談他的思想。

石介死後二十一年，歐陽修爲他撰寫了一篇感情充沛、文辭優美的墓誌銘，其銘云：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皇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此處贊美石介，指的是「道」、「德」，而不在文章。統觀歐陽文忠公文集中與石介有關的詩文，大抵都是評論石介的從政和爲人，而絕少贊賞他的文章，這篇旨在對石介的一生作出總評價的紀念文章亦復如此。近時一些文學史論著以石介爲北宋古文運動中輔翼歐陽修的一員健將，大抵是因爲他寫了一組極論排佛、老，斥時文（楊億）而以言詞激烈著名的怪說上、中、下，而這兩個基本思想，貫串了石介的全部著作乃至他的一生。

反對佛、老和駢文，本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兩個顯著標志，石介既有極力頌揚自周公、孔子、孟軻、揚雄到韓愈的道統、文統之語，又有怪說之類反對佛、老與時文的述作，其爲後人排進古文家的行列，是極自然的了。但作爲北宋古文運動的領導的歐陽修並沒有表過這個態，這也是事實（歐陽修與尹洙、蘇舜欽等認識亦在天聖八年（公元一〇三〇年）前後，嘗論與彼等相與作爲古文於天聖中而不及石介）。而且統觀石介的創作實踐和思想，同北宋其他一些著名的古文家（如在他之前的王禹偁和在他之後的蘇軾等人）也有明顯的差別。

先說排佛、老。唐代古文家反對道、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和目的。其一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要維護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其二是在社會經濟方面，反對佛、老之徒的浪費和不事生產。宋代古文家之於佛、老學說的本身，在態度上則已有所不同，蘇軾、王安石等對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兼收並蓄前人論之已詳，即如在宋初開創了以駢散結合、平易暢曉爲基本風格的宋代散文獨特面目的王禹偁而論，其反佛的主要目的，也側重在社會經濟方面。他在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所上的應詔言事疏中

論「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曰：

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匹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巨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輩」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皇朝文鑑卷四二）

據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一三、北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七道釋統計，到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年），天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再加上道士、女冠二萬多人，真是個龐大的數字，其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程度之嚴重，可想而知。在這個意義上講，古文家們反對佛、老，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石介的反對佛、老，其側重點却不在这裏，以其攘斥佛、老的代表作怪說上爲例，其文略云：

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常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常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

可知其反對佛、老，目的主要在於捍衛儒家之道的正統地位，而並不在佛、老之徒本身。此與孫復以佛、老之盛爲「儒者之辱」（孫明復小集卷三儒辱）的說法正同。這一點怪說下說得更加直截了當：

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僞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壞亂破碎我聖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與楊億也！

這副凜然不可侵犯的衛道者的架勢，與其說是爲古文運動從思想上开辟道路，毋寧說是在開兩宋道家先聲。雖然，石介反對佛、老，誠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圖在。

趙宋建國之初的兩位君主太祖、太宗，都是雄心勃勃力圖恢復唐朝強盛時期疆域的帝王。到了真宗時代，以澶淵之盟爲標志，宋王朝已漸漸露出怯懦的樣子來。當時，一般具有愛國熱忱的士大夫，對民族問題十分敏感。他們一方面搬出華夏大一統的舊訓來推動朝廷繼續向北發展，但在北方民族越來越強盛的現實面前，一方面又本能地感到一種潛在的威脅，這反過來又促使他們對華夏正統的傾心和狂熱的宣傳。而石介的反對佛、老，也正是提高到「尊夏攘夷」這樣一個高度來認識、來論述的。他在中國論（徠集卷十）一文中說：

聞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龐眉名曰「聃」，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中國之俗，以其書易中國之書，以其教易中國之教，以其居廬易中國之居廬，以其禮樂易中國之禮樂，以其文章易中國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國之衣服，以其飲食易中國之飲食，以其祭祀易中國之祭祀。

爲了把思想文化上的排斥異端同民族問題上的排外主義等同起來，連在中國土生土長的老聃，也成了夷人。顯然，這裏的討論已不單純是思想文化問題，更多的倒是時事政治了。從今天的立場上看，石

介此論，自然有悖於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而其獨尊儒學、排斥一切其他思想學說和外來文化，也顯得偏狹和保守。但在當時，西夏元昊陰謀南犯的迹象已經越來越明顯，後來終於在寶元元年（公元一〇四〇年）爆發了西北邊境戰爭。石介的這種宣傳，對於加強民族意識、保護華夏文化，還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假如說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儒學運動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南宋前期的蓬勃開展，可以看作是民族精神在思想文化領域裏一種積極反映的話，那末，石介、孫復等人的排斥佛、老、「尊夏攘夷」活動，已經給朱熹他們帶了一個很好的頭。

再說斥楊億。石介排佛、老既提高到維護華夏文化這個理論的高度來認識，其斥楊億亦復以保守儒家傳統為出發點。怪說中略云：

昔楊翰林（億）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有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

大家知道，楊億在宋代之所以有名，是因為他開創了西崑體而以「詞筆冠映當世」（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五引宋真宗贊楊億語），並沒有在哲學上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即所謂楊億之道來取代儒家之道。而怪說中後文斥責「楊億之道」的具體表現，也僅是「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

組而已。此處所言，乃指楊億之文而非楊億之道，是很明顯的。然則，石介是把「文」跟「道」當作一樣的東西來看待了。這一點從徂徠集卷一九祥符詔書記看得更清楚：

故楊翰林少知古道……然以性識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爭勝，獨驅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塗（柳開）、黃州（王禹偁）、漢公（孫何）、謂之（丁謂）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

在石介看來，古道卽古文，不爲古文卽反對古道。道卽是文，文卽是道。

唐代古文家論文，有所謂道統和文統，韓愈的原道和進學解，可以分別作爲這兩方面的代表。在他們的心目中，道統和文統原是兩個不同的方面。入宋以後，柳開首先將兩者合而爲一。他的應責有一段代表性的言論：「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河東先生集卷一）石介則進一步把它發展到了極端的地步。

對於石介的這種態度，歐陽修在當時就不以爲然。（詳與石推官第二書）後來，蘇軾則更加旗幟鮮明地指出：

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二九議學校貢舉狀）

東坡之辭，雖不免偏激了一點，但却說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封建時代士大夫階級的文學創作，盡管藝術形式千差萬別，哪怕古文也好，駢文也好，在爲統治階級的思想政治（道）服務這一點上則是相同的。對此，早在宋初的張詠就曾經做過爽快的自我表白：「視文之臧否，見德之高下，若以偶語之作參古正之辭，辭得異而道不可異也。或謂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蕩，非文也。」（乖崖集卷七）歐陽修也曾說過：「偶儷之文，苟合於理，也未可非。」（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七三論尹師魯墓誌銘）

楊億、劉筠的許多作品，的確存在着「好今以蕩」、片面追求形式華麗的錯誤傾向，西崑體的追隨者專門從這一方面下工夫摹倣，更是應當加以否定的。正如慶曆三年王安石所批評的：「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王文公文集卷三六張刑部詩序）其毛病在於過分講求表現形式而妨礙了文章內容的表達（「屬情藉事」）。石介等人因此而否定一切帶藝術性的東西，（徂徠集卷二十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借頌揚士建中而剖白自己的文論主張說：「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爲文不尚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之教。」就滑到了另一條岔道，即張詠所謂「好古以戾」上去了。到了後來的朱熹，這一觀點遂發展成爲「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一三九）的典型的道學家文學觀。平心而論，哲學家做文，主要依靠抽象思維，只要條理清楚、講說明白便好，過份強調寫作技巧、修辭方法，反倒有「以文害道」之嫌；但因此而要求文學家的創作也不能講求藝術性，同樣不符合藝術思維的特殊規律。